

立志成为栋梁之材

——记新时代白城好少年标兵高赫辰

●洮轩

高赫辰是洮北区明仁小学六年级学生。他是老师的小助手,家里的好孩子,同学的好朋友。他沉稳、内敛、聪慧,品学兼优,言行知礼,全面发展。

勤奋学习,求实求真。课堂上,对于老师的提问,他反应敏捷,思路清晰。对待学习有极强的自觉性和自己独到的见解,善于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刻细致的思考,逐渐形成了严谨灵敏的思维习惯,在日常学习中总结了一些好的学习方法。每当遇到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他总会尽其所耐心讲解。他从小喜欢阅读,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在保质保量完成所学内容和老师布置作业的同时广泛阅读各种书刊,所做的读书笔记就有几十本。勤奋刻苦是他的学习常态,他自己曾经说过:“要做就要做好。”

在知识的海洋里,他是一个快乐的畅游者,不断学习和总结,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学能力。从老师的辛勤耕耘中一点一滴积累着知识;与同学们在互学互比中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几年来,他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不服输精神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在学年组名列前茅。他在不断自我提

高的同时还主动关心其他同学的学习,在同学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热心地给与帮助,耐心解答。在同学的眼里高赫辰是学习的带头人,更是大家的知心朋友。他守纪律,讲文明,热爱集体,乐于助人,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多次被评为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美德好少年、优秀学生、运动小达人等称号。

严于律己,尽职尽责。高赫辰同学不但品学兼优,还具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无论是哪方面的集体活动他都会尽力一搏,发挥出最高水平,争取到最满意的成绩。运动会、主题班会、比赛、各类活动,无一不体现了他团结进取的作风。他把班级视作一个大家庭,形成与班级共荣辱的观念。每天放学后,他都主动留下来和值日同学一起将班级室内外的卫生重新检查和整理一番。每当班级有劳动任务时,他脏活、累活带头干、抢着干,从不偷懒、埋怨。

为了给班集体争得荣誉,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参加对集体有益的活动。他经常组织同学们出黑板报,每一期黑板报从版面设计到抄写,都花费大量的心思,查阅资料;每学期结合不同的节日组织班级同学开展主题班会活动,担任主持人并表演节目。

在班级日常管理中,他尽职尽责,每天组织同学们早自习,成立了“帮困小组”,成绩优秀的学生与学习困难同学建立“一帮一”对子。他号召同学们不要随便扔垃圾,和同学组成志愿清洁队经常在校园内清扫、捡拾废纸、塑料袋,为同学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获得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勤劳体贴,独立性强。他待人以诚,真心关怀帮助他人。在家里,他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提高自己的自理能力。敬老爱亲,闲暇时间陪外公外婆散步聊天,让长辈们精神愉悦。他体味父母的工作辛劳,从不会乱花钱,勤俭节约。不事事依赖父母,想要成为父母的可依赖之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高赫辰正用自己的不懈努力,立志成为新时代的栋梁之材。

新时代好少年

两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于晓娜/文 王亚东/摄



7月14日,白城市龙跃建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向白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赠送两面锦旗,表达了对交巡警支队情系企业、服务企业的感谢之意。

这两面锦旗背后有这样一件事。为了全面助

力“一城三区”建设,深入推进“瀚海安全行”活动,白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不断加大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力度,全力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通行秩序。近期,民警在路面巡逻时发现域内一家从事商混

运输企业的车辆在号牌安装上有不规范的行为。

本着预防为主和对企业负责的态度,7月13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副支队长带领直属二大队和三大队的大队长及民警来到白城市龙跃建材有限公司,对企业负责人和驾驶员进行了一次整改约谈。

约谈中,民警重申了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企业要加大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督导和检查,层层落实安全责任,消除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企业员工和驾驶员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安全意识和规矩意识,坚决抵制交通陋习,杜绝交通违法行为。夏季高温多雨,运输安全隐患加大,他要求公司要对用工交通工具全面摸底排查,清除隐患,确保安全。约谈会上,民警们向企业下发了《运输车辆安全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对驾驶员进行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要求企业立即整改,建立交通安全长效工作机制。针对企业车辆出现的交通违法行为,根据白城市公安局助力“一城三区”建设工作措施中“首违不罚”的规定,给予口头警告,责令企业立即整改。

约谈结束后,企业负责人表示,非常感谢交巡警支队通报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当下“一城三区”建设正在进行中,运输任务艰巨,公司将按照交巡警部门的要求,整改隐患问题,加强交通运输安全教育力度,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坚决做到层层把关,落实责任,文明驾驶,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建设。

图为企业向民警赠送锦旗。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才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文艺界,而且对着一批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

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

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派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抗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

他把荣誉锁在抽屉里

——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张富清

张富清,男,汉族,1924年12月生,中共党员,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原副行长。

张富清在新中国成立前入伍,出生入死、保家卫国,以赫赫战功为中国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复员转业后,主动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生活,克己奉公、为民造福。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尘封功绩,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

1948年3月,张富清光荣入伍,成为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一名战士。他先后参加了壶梯山、东马村、临皋、永丰等战役。每一次战斗,他都是突击队员,先后炸毁敌人四座碉堡,是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其中在永丰战役中,他带领突击组与敌人近身混战,一颗子弹从头顶飞过,头皮受伤,继续作战,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孤军奋战持续到天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获机枪两挺。张富清在解放大西北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一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师“战斗英雄”称号和“人民功臣”奖章。

1955年初,张富清面临复员转业。他打听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是恩施,恩施最偏远的地方是来凤,他二话没说,便把工作地点选在了来凤,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张富清刚到来凤城关粮油所工作时,几乎每天都不能按时回家吃饭,加班是经常的事。上世纪60年

代,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他首先动员妻子孙玉兰辞去三胡供销社公职,减轻国家负担。大儿子遇到一个到恩施市工作的报考机会,张富清动员儿子放弃,下到万由林场当知青。1975年,张富清调到来凤凤洞公社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主动下到最偏远的高洞片区,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上世纪80年代初,张富清到建行工作后,白手起家,盖起了办公楼,开展“拨改贷”业务,由他经手放出的贷款,没有一笔呆账。

为了给国家节约开支,他在做白内障手术时选择最便宜的晶体。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让子女们安心工作,88岁时高位截肢后,张富清靠着假肢和支架重新站了起来。90多岁高龄的他,至今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看新闻联播节目。

从复员转业的那日起,张富清就“封存”所有战功记忆,包括对子女也只字不提。60多年深藏功名,淡泊名利。直到2018年底,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张富清才拿出尘封64年的勋章、报功书、立功证等军功证明。

张富清荣获“时代楷模”、湖北省“荆楚楷模”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据《人民日报》)

道德模范

电力防灾减灾三字经

电气火灾事故警示



某小区突发大火,周边居民立即拨打了119火警电话,大火被赶来的消防员扑灭,但屋内的物品几乎全被烧毁。事后,经有关部门调查得知,该起火灾是因为住户贪图一时便宜,在网上购买了劣质充电宝,充电宝在充电的情况下发生爆炸,引起火灾。

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国德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32)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史学习园地